

王宗勋◎著

清水江木商古镇

第 一 坪

非 外 借

 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民族出版社

王宗勋◎著

清水江木商古镇

第 一 坪

 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水江木商古镇——茅坪 / 王宗勋著. ——贵阳:
贵州民族出版社, 2017. 10
ISBN 978-7-5412-2336-5

I. ①清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乡镇—概况—锦屏县
IV. ①K927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8479 号

清水江木商古镇——茅坪

王宗勋 著

出版发行	贵州民族出版社
地 址	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贵州出版集团 18 楼
邮 编	550081
印 刷	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	260 千字
印 张	14.75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次
书 号	ISBN 978-7-5412-2336-5
定 价	45.00 元

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出版资金资助

本书为2016年度贵州省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
专项课题“清水江木商古镇历史文化研究”（XTZD1621）成果



序

张新民

清水江乃长江支流沅江的上游正源，发源于贵州境内都匀与贵定之间的斗蓬山南麓，在湖南境内的洪江黔城接纳溇阳河，遂改称为沅江，并注入洞庭湖，为贯穿黔湘两省的重要交通动脉。自明代开始经营开发以来，其在国家视野中的战略地位便显得极为重要。具体分析清水江—沅江的地理区位优势，则不仅其下游经洞庭湖直接与长江互连互通，甚至可以转运河直接通达代表国家政治中心的北京，形成了清水江—沅江—长江水道航线，如珍珠般串联了大江南北的广袤区域，有裨于推动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文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，更重要的是其上游转陆路可与滇黔驿道相衔相接，构成了水陆一体的军事交通要道，能够穿山越岭直入云南边疆腹地，发挥了控驭整个西南地区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，推动了沿途广大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发展进程，遂在明清两代边疆开发史中，占据了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
清水江作为长江支系文明，尽管历代史家的记载多有遗漏，甚至有时根本就未进入其视野，但当地旧石器与新石器史前遗址的发掘，以及自商周经战国秦汉以迄宋明众多考古成果的公布，均足以说明当地文明的灿烂与悠久。而诸如水稻农耕、干栏建筑、宗教祀祭、祖先记忆等，虽不乏地方文化的个性特征，丰富了南国多元民族文化的具体内涵，但也显示了长江文明的整体共性，体现了与黄河文化不尽相同的风情韵味。至于物产之交换，经济之往来，民族之迁徙，文化之互动，无论规模范围是大是小，速度节奏是快是慢，均如滚滚流淌的江水一样，始终未曾

有过中断止息，当然也演绎了无数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，产生了大量兴衰更替的历史现象。清水江在提供各种生存和生活的资源及交通航行的便利的同时，也在形塑着地方族群的精神性格和社会文化特征，将其比喻为当地人民的母亲河，当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客观事实。

不过，从明代大一统秩序治理的眼光看，清水江流域毕竟存在国家力量未能涉足的“生界”，范围主要集中在中上游广阔的少数民族“苗疆”生活区，直到清雍正年间凭借武力开辟后，分别设置了八寨、丹江、台拱、清江、古州、都江六厅，才意味着国家力量开始实施了行政方面的有效管控。开辟“苗疆”固然是历代边疆开发史的继续或延伸，不能不与帝国力量的具体在场有关，但也是传统文化核心区逐渐南移的结果，契合了地方族群不断融突磨合的发展大局。从此崇山峻岭不再是民族阻隔区分的天然屏障，反而转为资源与财富大量累积的美丽象征。华夷秩序的全面重建，即所谓“必实心教化，务令苗汉相安”（方显《平苗纪略》引雍正朱批），固然离不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与合作，但最终消泯其界划的，仍为文化的互嵌互动与濡染涵化，既有赖于交通道路的方便和畅达，更离不开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日常接触与交往。文化的多样或多彩乃是合理健康的生态秩序格局得以存在的前提，当然也可以和谐相处的方式整合为传统天下观念下的复杂“国族”共同体。孟子岂不早就有言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，卒于毕郢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，得志行乎中国，若合符节，先圣后圣其揆一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具见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，夷夏乃是两个可以不断交叉互涵的概念，区分的标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；多元一体意义上的自发性“国族”整合工作，实贯穿于历史发展的整体全程，凝聚而非分裂才是人间沧桑变化的正途。“政令法度，所以接下之人百姓”（《荀子·王霸》）。生活世界的交往关系及与之相应的秩序建构，其背后总是潜藏着民族集体的深层意志。触摸历史本质上即是在触摸人类最深层的心智，或许在宁静的日常生活中才更

容易发现它的存在。因此，在关注国家开发苗疆宏大叙事学表达的同时，当更有必要聆听生活世界乡村民众的轻微絮语。传统与习俗本身也是秩序建构的基础，无视其自动自发的内在诱变动因，缺乏传承与变异比观互照的历史性眼光，结果总是容易误入傲慢的陷阱或偏见的歧途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与徽州文书的丰厚遗存类似，清水江流域也保存了大量的民间契约文书，而无论衡以种类或数量，都堪称人类历史记忆的瑰宝。与徽州文书转辗流出和分散保管，导致归户性信息丧失所不同，清水江文书则因其难得的在地性特征，更多地保存了固有的户属形态，乃是与百姓生活记忆血肉相连的活材料，而非经过官方意识加工过滤了的死材料，当然极有裨于学者结合田野调查展开个案研究，从而更好地以“知识考古学”的方法还原地方社会历史的真实，把握百姓日常交往方式的原貌，弥补地方性知识长期流失的缺憾，贡献更多的区域研究的个案成果。而以民间文书比对典籍文献，同时展开各种田野调查，则不难看到国家政治、地方市场、历史记忆和社会结构等各种因素，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形塑族群文化与重构地方秩序的作用。正是有鉴于此，长期扎根于基层社会的王宗勋先生，才出于他对乡邦文献搜集整理工作的热爱，同时也凭借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敏锐的辨识能力，先后与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合作，编纂出版了洋洋大观的三辑《清水江文书》，自撰了四卷本的《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》，出版了《寻拾遗落的记忆：锦屏文书征集手记》、《清水江历史文化探微》等专著，均为长期立足于地方社会的客观实际，在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上双管齐下，不断辛勤耕耘获得的学术成果。而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新著——《清水江木商古镇——茅坪》，则与既有的研究果构成了前后相联的知识系谱，不仅反映了个人治学的心路跋涉历程，而且也丰富了日益引起学界瞩目的清水江学的具体内容。

宗勋撰写《清水江木商古镇：茅坪》一书，之所以选择茅坪为研究对象，诚如他自己所说，乃是因为“茅坪扼据清水江下游的湘黔交接咽喉位置之上，既是湘楚地区进入苗疆的门户，又是苗疆对湘楚地区开放和接触

的前沿”。当地“以黔地丰厚的森林等资源为依托”，长期“接纳从湘楚地区溯江而上的汉家文明”，正好可以从小地方看大历史，即透过茅坪一地之经济文化变迁，一窥清水江区域社会特别是木商文化的源流演变过程。

大家知道，清水江流域的原始森林面积极为茂密广大。据郭子章万历《黔记》卷十三《帝王事纪》，洪武二十九年(1396)八月丁亥，卢溪黔阳诸洞蛮夷叛，楚昭王刘楨奉朱元璋之命“出师，自沅州伐山逾阻，至天柱山，深入苗寨，平之”。又据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十九《开设贵州》，明洪武三十年(1397)冬十月，朝廷因古州洞蛮林宽“聚众作乱”，遂命左都督杨文为征蛮将军，统京卫、江、湖兵往征。指挥朱俊捉拿林宽并缚送京后，朝廷“兵至沅州，伐山开道二百里，抵天柱，遂涉苗境营小坪，而以偏师别由渠阳零溪西南山径銜枚夜发，犄角以进，分道夹攻，直抵洪州、泊里、福禄、永从诸洞，大破之”。足证明代开发经营清水江—沅江流域，乃是沿下游不断由上游推进，然后才逐渐逼近“苗疆”境域，并成为开设贵州用兵先声的重要一环的。而所谓“伐山开道二百里”，适可说明深山大箐，绵亘无极，林木资源极为丰富，覆盖面已逶迤至沅江，且长期绝少大规模人工运输开采。至于“苗疆”腹地，譬如其中之牛皮大箐，甚至在清雍正年间“苗疆”开辟后，“化外”之地已变为“新疆”，在清人视域中，也是“绵长数百余里，横亘于新疆之中，峭壁悬崖，高出云表，深林密树，雾雨不开，泥泞没膝，虺蛇交行，不但从来兵威所未临，即人迹亦所罕到，询之本地苗蛮，亦止能知其附近大概，不能悉其幽邃深远”（张广泗《苗疆告竣撤兵疏》，引自乾隆《贵州通志》卷三十六《艺文》）。故无论“皇木”例行采办或商业贸易伐木，均是从沅江下游向清水江上游渐次推进，即以辰州（治沅陵，领沅陵、辰溪、卢溪、溆浦四县）为中心，先在湖广行省的沅江两岸进行，然后才不断向上游清水江延伸，逐渐深入到今贵州天柱、锦屏一带，同时也留下了“三帮”（徽州、临江、陕西）、“五勦”（湖南常德、德山、河洑、洪江、托口）商人的足迹。

空间的延伸必须以时间的推移来加以配合，由长江溯沅江入清水江显然是有时间先后的。尽管明代后期外地商人已开始进入天柱、锦屏等地，甚至不能排除偶尔犯难深入上游“苗疆”，进行木材采购贸易的可能，但仍不能据此认为官方性质的“皇木”采运，已越过沅江及位居清水下游的天柱，直接抵达了中上游地区或“苗疆”腹地。从整体上看，明代的“皇木”采办已广涉湘、黔、川三省，但就清水江中上游或“苗疆”地区而言，仍未见相关史志文献有所记载。

王士性《广志绎》卷四《江南诸省》“湖广”条云：

楚中与川中均有采木之役，实非楚、蜀产也，皆产于贵竹深山大壑中耳。贵竹乏有司开采，故其役端委楚、蜀两省。木非难而采难，伐非难而出难。木值百金，采之亦费百金；值千金，采之亦费千金。上下出阪，大涧深坑，根株既长，转动不易，遇坑坎处，必假他木抓搭鹰架，使与山平，然后可出。一木下山，常损数命，直至水滨，方了山中之事。而采取之官，风餐露宿，日夕山中，或至一岁半年。及其水行，大木有神，浮沉迟速，多有影响，非寻常所可测。

按贵竹，“元为贵州，寻改贵州等处军民长官司”，明代“改贵竹长官司”（嘉靖《贵州通志》卷一《建置沿革》）。明隆庆二年（1568）“迁程番府治于会省，改名贵阳。益以贵竹、平伐二司”（郭子章万历《黔记》卷二《大事记下》）。而贵阳既为一省之省会，贵竹本乃古竹王名，当可“櫟括全黔制度之概，政事之纲”（万历《贵州通志》卷一《省会志》）。故王士性一方面称：“出沅州而西，见（晃）州即贵竹地，顾清浪、镇远、偏桥诸卫，旧辖湖省，故犬牙制之。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，两岸皆苗”（王士性《黔志》）；“晃州以西，贵竹地也”（《广志绎》卷一《方輿崖略》）；一方面又强调：“如贵竹长官司改县已多年，而强臣犹欲取回为土司，天下岂有复改流为土者？”（王士性《黔志》）前两引之贵竹，显然即是广义的称谓，乃泛指贵州全省；后一引之贵竹，则当为狭义的专名，乃专指贵阳属下之贵竹长官司。而所谓“贵竹深山大壑”，“贵竹乏有司

开采”云云，亦当泛指整个贵州行政辖区，同时又暗喻政治中心为省会贵阳。则至迟万历年间，无论川中或楚中之“采办例木”，均已波及当时贵州全省，当断无疑义。

川中“采办例木，因无关讨论主题，可暂不置论。楚中采木涉及贵州者，则必然依托清水江—沅江水运之便。其具体路线，主要有三：一是由沅水辰溪沿支流辰水而上，上游即为锦江，可达铜仁地区，木材从深山砍伐运出后，便可顺江而下，经洞庭湖转入长江中下游，显然为官方采木必选之地；再则从沅江黔阳（洪江）溯澧阳河（镇阳河）直抵镇远及施秉偏桥卫，亦同样有采木必需的水运交通便利；三即沅江上游清水江，明代万历年间的官方采木，似已推进至清水江下游，即与晃州毗邻的“外三江”（奎处、清浪、三门塘），清初则向上扩大至“内三江”（茅坪、王寨、卦治）。当然也可从省会贵阳出发，经湘黔驿道抵清水江上游都匀地区，然后再深入大壑巨山采伐，并寻觅与水道不甚隔远处，由陆路多方设法拽运至支流，最后由支流经清水江—沅江转辗运抵目的地。

由朝廷“端委楚、蜀两省”督办的“例木采运”，主要用于京城殿庭，木质往往为栲木，偶尔亦可用杉木，时人多称其为“大木”。但小者则适合器具之用，名目种类繁多，主要用于商业贸易，多贩运至江南一带。王士性亦有介绍说：

天生栲木，似专供殿庭楹栋之用。凡木多困轮盘屈，枝叶扶疎，非杉、栲不能树树皆直。虽美杉亦皆下丰上锐，顶踵殊科，惟栲木十数丈余，既高且直。又其木下不生枝，止到木巅方散干布叶，如撑伞然。根大二丈，则顶亦二丈之亚，上下相齐，不甚大小。故生时躯貌虽恶，最中大厦尺度之用，非殿庭真不足以尽其材也。大者既备官家之采，其小者土商用以开板造船，载负至吴中则拆船（卖）板，吴中拆取以为他物料。力坚理腻，质轻性爽，不涩斧斤，最宜磨琢，故近日吴中器具皆用之，此名香栲。又一种，名鬬柏栲，亦名豆瓣栲，剖削而水磨之，片片花纹，美者如画，其香特甚，爇之，亦沉速之次。又一种名瘿木，遍地皆花，如织锦然，

多圆纹，浓淡可挹，香又过之。此皆聚于辰州。或云，此一枏也，树高根深，入地丈余，其老根旋花则为瘿木，其入地一节则为豆瓣枏，其在地上者则为香枏。（《广志绎》卷四《江南诸省》“湖广”条）

可见明代万历年间，木材贸易的聚集地，当在沅江的辰州，虽然国家力量的经营开发仍在不断溯江而上，渐次扩大其地域涵盖范围，大体已逼进“苗疆”周边地区。而清水江下游的岔处、清浪、三门塘等处，当已成为木材的重要转运站，但仍不能将清代才兴盛起来的“内三江”，即今锦屏境内的茅坪、王寨、卦治等繁荣一时的木材贸易市场轻易由清初提前错置于更早的明代。

岔处、清浪、三门塘等“外三江”木材贸易市场，乃是在明代国家开发力量不断沿沅江向上游延伸，最终抵达“苗疆”周边地区的整体历史背景下，才逐渐兴盛繁荣起来的。由于“大木”生长周期较长，数量相对较少，如同商人为牟利可以跋山涉水，能够冒险深入大山购木一样，官方为完成朝廷采办任务，亦必鼓勇涉足险岭，寻找可充殿庭楹栋之用的“大木”。王士性所说的“风餐露宿，日夕山中，或至一岁半年”，决非一时偶尔夸大之言。如嘉靖年间王重光出任贵州左参政，“会兴大工，职司采木”（李一瀚谕祭贵州布政使司左参议王重光文，引自郭子章万历《黔记》卷十二《群祀志》），“出入山箐，履千丈悬崖，以一木之舟济于是，冲岚冒瘴疔，勤事以死”（郭子章万历《黔记》卷三十九《宦贤传·王重光传》）。而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孙象乾以兵部左侍郎总督川湖贵，“是时有指挥张朝、王之屏奉委采木，不避艰难，水涨，有巨木阁滩湾，朝与之屏先卒徒入水，掀拨巨木，溺死。事闻，赐葬”（郭子章万历《黔记》卷三十九《宦贤传·孙象乾传》），遂从祀象乾之祠。均仍可见“一木下山，常损数命”，的确并非夸大之虚语。而尽管山大箐密，路塞不通，但迫于政令，亦必犯险冒难，深入其中踏勘。寻觅既已不易，伐运更为困难，峭斜平直处尚可转动，一遇深坑巨坎，则“必假他木抓搭鹰架，使与山平，然后可出”。出山后则凭借湍急支流，转辗经大江运出，才能完成采办任务。

故明代清水江中上游“苗疆”周边地区“例木采办”虽未见直接文献证据，但偶或进入其间的可能，仍不应轻易排除。

清水江流域由下游而上游的拓殖开发，如《清水江木商古镇——茅坪》一书所述，由明入清后仍在继续，显然已逼近“苗疆”地区。剧烈的社会变动及其所引发的王朝更替，并没有改变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。据道光七年（1827）岁戊子冬月立于天柱清浪的无名“争江碑”载：

尝思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其于山川水土，各有界至之攸。是以我等地方自开辟清水江以来，蒙前各大宪设立坌处为采办皇木之所。至康熙二十四年，客苗乱行，被黎平府属之毛平、黄寨、卦治三处乘机霸市，擅设三关，上下经控，抚、藩、臬道名裁，因豪恶龙永蟻等财多讼能，故失江坞。将我柱属王朝富、伍仕仁、刘秀刚等流放口外，苦不堪言。至乾隆年间，洪水泛涨，沿河流木，捞获甚多，上下争控县主马案下，蒙恩公断，流出阳豆溪角石槽以下，笋洞以上柱属地方捞获者尺长，纹银三分赎退，商等因赎价过昂，不愿赎退，情愿照市价买。迨至道光年间，洪水泛涨，客苗之木被水冲下，沿河捞获甚多。因豪恶龙承标等复控于天柱县主李案下，蒙恩给断，以照旧章，久后不得争讼，亦不得仍蹈前辙。方挽勒石以附久操，永垂不朽云。

具见至迟延至康熙年间，清水江流域的“皇木”采办中心已由“外三江”即坌处、清浪、三门塘，向上拓展至“内三江”即茅坪、王寨、卦治。与此同时，随着“三帮”“五勸”商人的不断涌入，木材商业贩运的要地也逐渐由下游向上游移动，由“内三江”取代了“外三江”的中心市场地位，遂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引发了下游与上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，产生长期持续不断的“当江”权力孰重孰轻的争斗。“外三江”经济区位重要性的下降，即意味着“内三江”经济区位重要性的上升，边缘与中心地位的重叠与更替，即在经济文化区域内部也时有发生。只是真正形成规模较大的繁荣贸易市场，仍要到雍正年间开辟“苗疆”以后。也就是说，“苗疆”未开辟之前，“黔、楚、粤三省接壤之间，阻隔道途，难通声教，仍然夜

郎自大，肆意横行，地方官从不敢过问”（鄂尔泰《抚剿生苗情形疏》，引自乾隆《贵州通志》卷三十九《艺文》）。“苗疆”开辟之后，“凡古来化内之地，悉隶版图，古来化外之民，悉遵约束。黔、楚、粤三省边界，声息相闻，行李往来，履苗地如内地，上下舟楫衔尾连樯，懋迁有无，化居无复梗阻，汉民安，苗民亦安”（方显《平苗纪略》）。政治的一统强化了经济的一体化，开发便不断由下游向上游纵深处延伸，木材贸易中心也随着采运进度向上游移动，遂愈加突出了清水江水道运输连接的作用。至于物产的交换、人口的流动、知识的传播、文化的辐射，也都由于清水江水道的畅通，较诸过去显得愈加快捷。故无论临时性的皇木采办，抑或定期性的“代办例木”，也只有到了清初特别是雍正年间河道浚通后，才更多地见诸各种典籍文献。至于民间契约文书的遗存，尽管触媒的因素颇为复杂，但雍正年间以后数量突然剧增，显然也与木材贸易市场的刺激影响关系密契。锦屏卦治对岸江边的嘉庆二年（1797）摩崖文《奕世永遵》：“徽、临、西三帮协同主家公议：此处界牌，以上永为山客湾泊木植，下河买客不得停篙。谨为永遵，毋得紊占。”（摩崖已被卦治电站水库淹没）便清楚地说明，“苗疆”开辟以后，三帮商人涌入当地贩卖木植的人数已相当可观，不仅形成了水客（买客）与山客（卖客）及具有中介性质的行会复杂交易的中心市场，而且产生了大量维护地方经济秩序规则的民间协商活动，于是在为沿江两岸社区带来程度不同的繁荣的同时，也有了基于经验事实和利益博弈的“江规”的制定。

“争江碑”作为反映民间记忆的重要原始资料，明显投射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倾向，当然也可说是对国家政治的巧妙利用，说明国家、地域、社会、族群、个人等不同层次的复杂力量，都已介入了林木砍伐、出山、转售、成交、运输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之中，不仅区域的隔阂已经消解，族群的边界已经打破，各种秩序力量开始重新寻找新的组合方式，而且山、水、人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调整，新的聚落经济实体开始涌现，内地化的发展方向已十分突出。

与木材采运来源地的移动相应，上游的茅坪、王寨、卦治，遂逐渐取代了下游的盆处、清浪、三门塘，成为木材贸易的聚散市场。当然也足以证明，官方“大木”的采运，当然也包括民间商贸用木，实已深入到了上游纵深处的“苗疆”腹地，连接了台拱、清江等广大木材生产供给地域，形成了一个以“内三江”为区域贸易市场中心，凭借清水江—沅江主干流运输渠道，集众多支流及木材产销地为一体的木商贸易网络。木材贸易带来的财富，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，而且催生了一批令人称羨的巨富，当然也造成了上下游之间财富分配上的差异，从而围绕“江利”引发各种民间纷争，遂成为维系市场经济秩序必须关注的核心，既有国家力量直接间接的介入或干预，也有地方社会力量形式多样的协商和谈判。秩序的建构主体固然离不开国家一统格局下的行政理性，但更取决于地方民众生活交往必有的协调经验，因而在关注国家政令举措与成文法的同时，也有必要重视民间规范体系和习惯法。二者长期融突整合，主要表现为文化调适行为，当然也会产生诱导性的变迁力量，成为秩序建构的重要组成因素。即使上游开发较晚的“苗疆”，也在与下游开发较早的地区的交往过程中，特别是在木材采运刺激因素的影响下，朝着一体化的区域变迁方向发展。边缘与中心的重新整合，既是秩序的再造，也是文化的重建，集中反映了地方社会交流互动的时代特征。所谓“国有国法，行有行规”，即说明必须同时具备国家与社会双重观照的眼光，才能更好走进地方社会秩序建构的历史世界。

镶嵌在清水江畔的苗族、侗族古镇茅坪，乃是因木材贸易活动兴盛起来的一大中心市场。作者首选其为分析讨论的对象，正是想由近及远，从点到面，将语言叙事的镜头推向清水江流域全境。而凭借宏（观）微（观）反复比较定位的方法论原则，或许才能更好地认知历史活动场域中的地方社会与族群关系。认真阅读《清水江木商古镇——茅坪》一书，即不难发现，作者追怀的是往昔逝去的故事，暗藏的则是当下现实的关怀。所谓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；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；

黎民於变時雍”云云(《尚书·尧典》)。虽然是遥远的古典文明的真诚训诫,却未必就不能迺来形容今人的价值抱负,只是学者走的是客观认知和理性分析的道路,他的抱负必须以历史事实与社会经验的可靠解读为基本前提而已。

最后,想稍微补充说明的是,清水江流域因木材采伐贸易以及长程运输而兴盛起来的聚落,在清水江两岸都有程度不同的分布。将其连接起来的,固然是从深山密箐砍伐运出,又顺江源源滚滚流动不已的木材,但更重要的则是以木材为“标的物”,透过利益行为将清水江改变为商运航道的诸如山客、水客、排夫一类的普通民众。山客、水客、排夫等普通大众,同样是区域历史的创造主体。无数生动的木材运输和贸易交往故事,都是通过他们才得以发生的。尽管国家政治的渗透性在他们身上也有或明或暗的表现,市场运作的利益链条并非他们所能完全掌控,但正是他们在清水江留下的身影和足迹,才构成了区域社会极为重要的叙事学内容。有幸的是,《清水江木商古镇——茅坪》一书将研究的眼光从茅坪投向整个清水江流域的同时,也对山客、水客、排夫的行踪或事履有详细的交待,可见作者的叙事学策略,或者说他的区域学研究取向,与其说是以单一的茅坪古镇为中心,不如说是以苗族、侗族的整体生存状况为中心。正是以苗族、侗族的整体生存状况为中心,才从小地方呈现了大世界,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社会变迁的多样与复杂,感受到族群关系的变动与调整,了解到社会基层细胞的运作特征与生计方式,触摸到乡村民众的利益态度和权力诉求,把握到地方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与客观图景。

区域社会整体图景的历史性还原,需要做大量的个案调查与分析研究工作。以河流水道为视角,观察区域社会历史的动态化变迁过程,当然有必要将一个个孤立的个案,整合进更加系统完整的分析框架。可见区域社会历史的研究,不仅意味着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增加和积累,学术成果的获得只是个案式的重叠与堆积,更重要的是还象征着认知传统中

国方法论上的多元，需要透过区域模型来整合各种新知。原因是国家政治治理从来都离不开地方性的实践，认知地方社会本质上即是认知传统中国。多层互观比较的方法永远都是研究者所必需具备的。即使社会发展到今天，以全球化为整体背景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规模愈来愈庞大，但地方社会依然是其实践不可或缺的场域。环顾世界各国，全球性与在地性，一体化与多元化，依然是时代发展的重要潮流。而以清水江水道所承载的经济文化圈为观察视角，了解区域社会变动的复杂情况，当然也容易整合各种个案性研究资源，从而更好地判断传统中国社会的动态性发展特征，寻找问题意识催逼出来的合理解释学新范型。如同整体史的研究诉求并不排斥微观研究一样，微观史的研究目的也有必要直接指向整体史研究。正是有感于作者在基层从事学术研究的艰辛与劳作，尤其是对地方社会的敏锐观察和心得，我才乐于向学界推荐《清水江木商古镇——茅坪》一书，以为该书的出版不仅代表了清水江学研究的最新成果，而且预示了西南区域社会研究的不断深挖与开拓。

是为序。

丙申年酷暑谨识于筑垣花溪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